

导论:争论与“画家象”

保罗·维奥蒂(Paul Viotti)和马克·考皮(Mark Kauppi, 1987)将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和全球主义看做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三种主流学派。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 1986a)描述了三种女性主义认识论:经验主义认识论、立场认识论和后现代主义认识论。我认为,这些对主流学派或不同认识论的列举,都没有穷尽该领域中可能值得研究分析的内容,尤其在国际关系与女性主义的学术结合点上尚留有诸多处女地。

从美国一些主要的国际关系杂志(如著名的《国际研究季刊》、《国际组织》、《世界政治》)中,几乎很难看到女性主义的文章,这足以看出该领域研究中的空白。不客气地说,女性主义者阅读这些杂志时会怀疑,国际关系与女性主义的关系似乎就如“大象”去研究“美学”,它们之间是否不可能有关联性。当然,可聊以慰藉的是,美国有几家国际性的女性主义杂志,如《符号》、《女性主义研究》以及《女性研究国际论坛》,对国际关系与女性主义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在大西洋彼岸的另一个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地英国,一本关于国际问题研究的刊名为《千禧国际问题研究》的杂志,在1988年曾有过国际关系中女性题材的专门讨论。⁽¹⁾最近,一本专由女性主义者编辑的刊名为《选择》的杂志,也有过关于“女性主义眼中的国际关系”的相应主题的讨论。⁽²⁾可见,随着国际关系与女性主义界线的日益明确,女性主义者对国际关系的挑战呈日益上升

趋势。

在亚里桑那州凤凰城的动物园里，有一头名叫“鲁比”的亚洲象，能以轻快的步伐体现其偏好与视觉艺术之间的关系，还能画出抽象的表现主义派图案，⁽³⁾它仿佛是一头有智慧、懂美学的象。她的‘奇怪’行为使她的管理员也成了‘认识论’专家，管理员会这样反思：“当鲁比从饲养员提供的绘画调色板中选择不同的颜色时，它在思考或感觉什么？”“鲁比怎么会知道，当最新的创作一完成，随之就自动停止绘画？”⁽⁴⁾所有这一切引发了人们富有想象而趋于一致的想法：“象”变成了“画家象”；“动物园管理者”变成了“动物园管理者兼艺术哲学家”，与此相应，来动物园的参观者也变成了暂时的“艺术批评家”。鲁比以及那些欣赏她那出人意料创作的人们，正在为艺术领域和“大象”的意义进行新的“圈地”。

这里使用“圈地”一词，是为了形象地说明对已知对象的身份——如“大象”、“男性”、“女性”等——进行重新审视，这种审视不是对其意义、身份、范围进行某种限定，而是让其获得某种更“开放”的意义。我将在后面章节中对此展开论述，并把“圈地”概念的使用建立于移情（这些情感往往源于一些奇怪而又似乎不可衡量的地位和状态）作用之上。这需要我们承认，那些已经被揭示出来的特定领域是属于某些特定（而不是作为“他者”的）主体、行为和才能的。而当我们利用该领域内异己者的知识，重新圈定学术领域的边界时，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种可能性。

当然，这并不是“圈地”一词在美国的通常用法。在美国，“圈地”一词能使人联想到移民们坐在铁路上的敞篷货车上，涌到西部，各种《圈地法案》，大规模地将印第安人的土地圈为属于美国公民的合法土地（重新命名为联邦土地）。根据《1862年圈地法案》，每英亩只要付一点象征性的费用，且在标志性的地方标上“地基”，土地就归属于圈地者并可占用5年，这块土地也就成了你的（或者

如通常所说属于他的)。(5)

“圈地”一词除了解放和排除两种一般性的理解外,还有其更浪漫、更开放的含义,如政府担保项目所记载的 用廉价的、密集的劳力去占有新土地,继而认同他们为地主、农场主、牛贩子、羊制品生产商等。可是,为了以这种方式圈地,先前的居住者必须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被驱赶走。通常他们被驱赶到预先为他们留好的荒无人烟的地方,并在官方文件中记载着对他们的诋毁。

今天,“圈地”这个术语也可用于那些先前没有多少农业种植经验而拥有农场的个人,或者指某些利用政府各种项目优惠去改进疏于治理的城镇邻居(城镇圈地)的个人。尤其是,当其他人离开土地、走出农场、远离老邻居,进入不确定的、甚至常常是不令人向往的地方时,某些人会以低价购买某一土地的所有权。

承认‘圈地’问题的雅努斯(希腊神话中有两副面孔的门神)面孔之后,我们应该意识到,将某些对象——土地、现象、理论——与特定的(而不是作为他者的)人和经验联系起来是紧张而有危险的。在认定能排斥种种其他因素的历史断定之前,无论当某人去开垦似乎是“圈地”外的空间,还是一再通过排外性努力使圈内边界自然向外延伸,都会产生不公平。(6)同时,我们看到那些被疏散者的‘圈地’行为,也是可以被某种方式‘圈定’的,这就是 改变乡愁观念以便让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做些什么。

把‘圈地’复原为一种方法,用于扩展知识和潜能,要求已有的圈地者与那些能把目光投向未来的人们表现出合作的意愿,来共同揭示那些已经遭到排斥与清除的各种故事、身份、变量和感觉,以使某些人可以进入那些已经清理出来的空白领域。同时,也要求有这种能力的人去占领大量的“域外”领地,而不仅仅是防护已经确认的家园边界。凯茜·弗格森(Kathy Ferguson 1993:154)称之为“流动的主体性”。

被权柄（这种权力本身就是变动的）所左右，但又不在权力系统之内。“流动的主体性”是理性的，人们正是在不断变化的遭遇和关系中，既经历变动，又不受羁绊，才形成这种“流动的主体性”。这一过程是模糊的：凌乱和多元混杂，不稳定与持续并存，对多样性的事物既讥讽又关切。

最重要的是，这一过程在政治难题前一贯拒绝坚持固定的主张。这在政治上是有利的，因为这样能使人们以更少的压力去维护自身的“边界”，而能更多地以尊重的方式与持不同观点的争议者进行商谈(*ibid*, 154)。有了流动的主体性，“大象看护者”才可能成为“大象艺术的鉴赏者”，国际关系的分析家们才有望转向女性主义的细腻研究，从而扩大我们每一个人的视野和知识。⁽⁷⁾

通过移情作用在研究领域中“圈地”，同样不能孤立于农场、近邻、新居民和理论的原创者，但也不能完全排斥某些已有的知识。相反，这一过程导致了对现有身份和理论的不同程度的忧虑，而这种身份和理论曾被普遍地视作为权威和真理。⁽⁸⁾ 本书主要探讨我们是怎样最先成为国际关系领域中“无家可归者”的，当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在该领域中圈定属于我们的地盘时，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⁹⁾

本书也考察了经由三次论战后形成的国际关系的特定领域，并充分关注了该学术领域内的性别内容，以及那些已经包含在内或被排除在外的各类现象。目前，我们正看到，一些有趣的、新的挑战是直接针对国际关系领域的，所以，我的观点是：那些已经拒绝性别思考的领域，不能让我们共享他人面临、经历着的情感，不能进入移情状态，那些他者的地位都已经确立，以致于国际关系研究只能如其所是了。

国际关系的困境

在国际关系中，一直蕴含着一个未曾认可但似乎已很陈旧的原则，即国际关系是专属男性的领域。对此，我可以肯定地说，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特征之一，是它作为人类客观知识的特定领域本身就是一个性别“盲区”。经过国际关系领域的三次论战，一再呈现给世人的感觉是国际关系是男性固有的领域，而‘女性’则属于另外的领域（她们可能会冒险涉足国际关系领域），她们所做的仅仅是‘男权’政治的辅助而已。

当谈到‘男性’和‘女性’时，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一开始必须确立这样一个观点：性别差异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不是恒定的和必然的。相反，我认为‘男性’和‘女性’在身体特征上只有细微差别，他们在政治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由社会构建的主体身份，进而由劳动、个性、地位、权力等因素强化其性别特征。就‘社会构建’来说，男性和女性其实都是人为叙述出来的‘故事’，当他们被讲述时，被告知是‘男性’和‘女性’；一旦我们进入这种故事情境，就有了对性别的确认和约束。两种性别的相互缠绕甚至颠倒，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能的，这使我们分不清男女的泾渭差别。可是，当故事情节中把男性和女性看做是自然的类别时，我也会顺其自然不加任何渲染地使用‘性别’一词。

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很少有关于女人或“女性”的论述。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涉及任何有关这类人或者说有关具有女性特征的官方说法。也有人认为，该领域全然没有关于人的故事，它所探讨的只是抽象的权力平衡、国家利益、国际机制、贸易流通等内容。奇奎塔·巴纳纳斯(Chiquita Bananas)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的外交实践，各军事基地的随军妓女(Enloe，

1989),以及《美丽的心灵》中为社会良心的毁灭而发出的哀泣,从中可以看到,“女性”是如何被排除在国际关系之外的(Elshtain, 1987)。⁽¹⁰⁾而且,在国际关系中,“男性”的角色常常是州长、政治家、战士、决策者、恐怖主义者、暴君和那些权力大于女性的人物。“男性”和“女性”经常处于被规定的地位,处于理论假定的行为特征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被规定的地位是正确的,不需要加以理论的阐述,也不意味着这种规定和假定反映出了他们内在的才能,所以,不需要为实现这些规定而努力。

我所关注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变迁中排斥人与“女性”特征的现实,并试图寻求女性主义方法论,以打破性别故事中认定的种种看法,显示女性主义在其他领域拓展中所具有的特定“圈地”经历。我认为,正是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早期论战和前理论时期的讨论,确立了国际关系的“男性”政治王国。

例如,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爱弥儿》中告诉我们,女性是性欲激情的永久奴隶,所以她们不能发展出影响和参与正常的政治文化所必需的理性。所有女性都归属于家庭的私人领域,而男性们却承担着公共领域的责任:爱弥儿能通过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激情,实现他真正的自我意志而成为自由者,(所以)索菲娅的任务是明确认识到,爱弥儿是能够成功的;因为,只要她的丈夫是有美德的,就能实现普遍的意志(Nancy Hirschmann, 1992: 70)。

再看看前人尼科洛·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在其论文“国家怎样因女性而破坏”里写的。有时通过诱惑,有时通过计谋和腐化,女性吸引男性以使他们减少理性而混淆私人事务与公共领域的关系(Pitkin, 1984)。再如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他(毫无疑问的)承认女性在自然状态中的母权,因此,当她们力图通过保护自己和孩子,反对那些对弱者阶层不尽义务的

人，进而保护那些已经被征服的人（Carole Pateman, 1988）然而就当下而言，事实上我们只是根据传统文化来理解‘男性’规则，但并不是只有男性才能在公共职位中取得成功。这意味着，“女性在政治领域中仍然具有不寻常的地位，并不只是普通的角色”（Hirschmann, 1992 :19）。

“女性”安全地处于政治之外的私人领域中，而男性生活在政府、社会契约式的“利维坦”和共同意志中。男性拥有象征身份的领地，可以否定那些会把某些人从政治领域中排除出去的“圈地”行为，而那些“公民国家”又互相注视，并宣布自己对此拥有主权。既然主权必须得到承认，或者它可能被侵犯，“男性”和他们的“国家”必须尽可能在国际关系中采取行动保卫它。吉恩·埃尔施坦（Jean Elshtain）说，“这是对男性的政治上的明确考验”。这一一再宣称自我主权独立并为之战斗的过程，再现了属于文明治理之外的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但这里又有一个复杂的问题：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特征包含着两种性别，而国际关系中提及的自然状态只是自然地由某一性别（男性）来控制。世界主义者，像阿贝·德·圣·皮尔（大修道院院长）和纽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他们主张通过提供普遍的政治标准以改造自然状态，进而取代或缓和国家间的冲突关系。但是康德在早期的“为了永久和平”的计划中，将母性权威、食物配给和其他与“女性”相关的一切都边缘化了。

接下来考察一下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两次正式论战。这两次论战为这个领域确立了某些相通的因素。第一次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争，主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国际关系主要研究的是在无政府状态下自我利益与领土实体上的国家运作，或者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发展出来的相互依存、共同合作与和平法则的网络体系。第二次论战是关于国际关系的方法论问题，争论焦点是

国际关系是否应形成一种可实证、可检验的理论，还是应追求逻辑推理与诸如“一个国家是否有权干涉另一个国家内政”的道德判断两次争论都限于讨论国家体系原则和各自的方法论问题。这些焦点问题的讨论究竟反映了国际关系与其他关系的不同，还是反映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男性对这些问题提出的只关乎他们自身的看法。如果是后者，我们就不能认为因为没有引起全世界非男性的、非西方的、非专业的人们共鸣，这些问题就仅仅是关乎男性的而且，我们会问，“女性”是如何并在何处被通常的国际观念和国际关系所排斥的。我们还会问，在这个新兴领域中，为什么没有人提及这种排斥现象，为什么没有人对权力的性别歧视作理论的概括。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对女性进行长期排斥的是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1)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者；(2)国家是一个整体，国家行为是合乎理性的；(3)国家追求权力，权力界定国家利益(Holsti, 1985)。在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中存在许多紧张因素，然而，性别冲突并不是人们所熟知的紧张因素之一。⁽¹¹⁾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家、男性决策者和绝大多数士兵都是男性，而普通的‘男性’和‘女性’通常只在受国家控制的‘家庭’领域内是‘安全的’存在着现实主义的创始之父，但没有人承认“创始之母”在神圣祖先的山峰上注视我们；存在着民族国家，但在国际关系中不存在现实主义者的大家庭；存在着国家利益，但相对于国家中的“女性”利益，国家利益只是含糊的、好战的。存在着理性主义，但人们对其真正意义和由谁提出的理解通常只是笼统含糊的。

在第一次论战中，理想主义挑战现实主义，并试图找到一种国际关系新模式，来寻求在自由国家之间处理国内政治应有的国际合作标准。在谈及国际关系中非政治性的西方女性这个问题时，理想主义者将和平观和利他主义运用于其中，但他们也没有将性

别因素考虑进他们的理论建构中。这种通过沿袭传统而专门将女性置于国际关系之外的做法，在特定的政治文化中是可能的——即便男性（或其他占支配地位的类别）为了确定和认同自身，事实上也得依赖于发现‘他者’；但长期以来我们所理解的（也如‘男性’所宣称的）女性地位的非自主性成了这种政治文化的标志。在这一社会关系的类型中，性别区分的两个方面都存在着相近性和排斥性、依赖性和独立性，各自都有特色的‘服饰’可以穿戴。作为理想主义者提供的例证，优势群体穿戴着弱势群体的服饰，会有躲躲闪闪的特征。（而当第三世界国家对国内的观众播放西方电视时，弱势群体穿戴起优势群体的服饰，并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竞争的良好标志——这表明‘女性’已在家中‘掌权’）。

作为第二次论战的方法论之争的一个分支，新自由主义的制度主义学派更具有当代科学的特征。它从理想主义中分化出来，但接受了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理论前提，这使它在论证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必须合作否则将会产生不理想的后果时，为自身设置了障碍。有人认为（Keohane, 1989a）合作的成功就是形成国家间最初的契约，促进国家进入有发展潜力的、普遍寻求共同体发展机会的地区。这其中“互惠”是关键，它能使国家间达成许多特殊协议（如互降关税等）和有更多合作的方法（如我们承认有益于大家的自由贸易）。

然而，当“女性”效力于美国海军这个作为与国际关系相对的国家机构时，为了集团利益和同等的回报，她们的行为非常职业化，并且以承受交往中非互惠的不平等和公开的性骚扰而为世人所知。⁽¹²⁾“互惠”表明的是那些政治家和他们的国家如何相互关联，而‘女性’是不可能真正进入国家政治的，因此她们也仅仅为权政治提供某些服务而偶尔涉足国际关系领域。当她们在国家军队某部门工作或作为秘书等供职于国际组织时，尽管她们能做得

很好，但在国际关系中她们仍处在非互惠的不平等地位。只有“男性”和他们的政治地位是互惠的，这意味着我们所理解的‘互惠’是完全受性别限制的。

国际关系现在正面临诸多后行为主义者的一系列质疑。约塞夫·拉皮德(Yosef Lapid, 1989) 概括了在第三次争论中所包含的研究传统、研究论题、新的研究项目以及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种种讨论(e. g. , Banks, 1985) ；着力探究有关国际关系主题涉及的外延，以及现有理论的假设前提(e. g. , Rosenau, 1990, 1986; Jervis, 1988) ；着力挖掘具有历史偶然性和社会发展性的知识体系(e. g. , Ashley, 1989; Alker and Biersteker, 1984; Halliday, 1985) 。这次争论的影响是深远的，让我们看到了国际关系发展的希望，它使得国际关系对话中的垄断者不得不重视不期而至的众多持不同政见批评家们的看法。在一系列后迪人们智慧的挑战中，白种男性的看法已不再是惟一的权威了。⁽¹³⁾

但是，第三次争论跟前两次一样，都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尽管女性主义的理论建构已有 30 年的历史，但第三次争论仍没有涉及‘女性’；性别’问题也没被列入拉皮德对争论所作评述之中。⁽¹⁴⁾ 当我认真阅读论战的备忘录后，发现这次争论不仅影响了该领域那些受到挑战的研究者们，而且影响了整个领域的发展。这次争论也使试图建立规范标准的谱系研究出现了种种难题，国际关系的研讨并未引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制度学、美学等理论，因为它们并不符合官方所讨论的国际关系范畴(Ferguson and Mansbach, 1991; Ashley and Walker, 1990a) 。第三次争论吸引着研究者们去确认模糊不清的类别、有歧义的观点，宽泛而又不可比的争论立场；建构学术性文化、政治生活的地位与功能、可拓展的可能性范围和一整套研究的标准。通过这些，以证实以往理论成果的价值和不足”(Ashley and Walker, 1990b: 367)。但在国际关

系领域中，女性主义著作仍处于边缘，她们的地位仍然被其他主张更多包含国际关系非性别的理论所占据。⁽¹⁵⁾

为什么总把我们这些超越传统的理论置于大大小小的国际关系论坛之外？在现时代，是否可以让另一种有效的理论渗入到单一化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来，使女性主义的思想像抒情诗那样不是强有力地奏出高音而是柔和地启示持不同观点的人们？我们能不能以同盟者身份相互合作，增强对持不同声音的人们的关注，在开诚布公中更富同情地进行合作与展开活动，并通过新的“圈地”实践重新建构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体系？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这取决于我们是否能重新认识性别、阶层、人种、制度、特权等。我们可以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家们进行深入交流，以找出长期被忽略、被认定为古怪而成为‘政治难题’的种种原因。⁽¹⁶⁾

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可能性

从国际关系领域排斥“女性”已经引发对这一领域中许多阴暗面的讨论，如扼杀生机、破坏稳定、导致无序、丢弃理想、丧失信心。于是，需要重新圈定一个内部结构与以前不尽相同的新领域，这个新领域与主流理论的观点和“男权”主张相悖，并将冲击教会的现行秩序。女性主义是研究性别的理论，诸如它的源起、发展、形态、立场、主旨和行为准则等，通常与现代的主体地位，如阶级、人种、年龄、宗教等研究紧密相关。现有的各种女性主义学说中，我们首先要研究女性主义理论的立场，其次要合理看待女性主义（或“女性”）的认知方式，再是要寻求解构‘女性’的方法，以便提供一种有发言权的本体论前提和行为方式。

在女性主义发展史上也有很多“女性知名人士”。这些人没有被束缚在‘家庭’内，没有孤独地留守家园。在某种程度上，她们从

没有在国家集权的战争中躲避，换一个角度说，正是她们支撑了那些战争。由于某些原因，我们对她们带给国际关系的思想、挑战以及建议知之甚少。她们的言论或者被遗落了，或者被遮盖了，或者被深埋了，或者被忽视了，只因拥有这些观点的人被称为女人或女性，她们在男性的政治世界里毫无地位可言。我的研究目的之一在于：通过透视她们的观点和行为，寻找并揭示许多被搁置遗忘的令人尊敬的不同女性：女神、圣女和对国际关系作出贡献的智者等。

同时，在心中认定以下观点是十分重要的，即如果大象能成为“艺术家”，那么女性和男性一样，也能成为任何一种角色。有了这样的观念前提，我们就不会在努力发掘女性价值中受困扰，并能以新的方法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整合、转型和发展中揭示新的可能性。女性本身以及那些标志着作为“女性”所独有的而不是他者的特性，赋予了女性精神上不带臆断的独创性。我们应该思考不同的认知途径以规避和防范围绕着理论使用方法本身所构成的主观臆断。

克瑞斯·布朗(Chris Brown, 1992b)曾论证规范化的国际关系，其实，这种理论建构方式也蕴含在女性主义的实践中，而不仅仅是道德的理论范式。这样不论国际关系中的性别理论是否恰当，对国际关系领域中所有性别化的寓意与解释，都应提出质疑。女性主义理论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三条途径来关注女人、女性和在各种学术标准下的其他性别问题。当然，各种途径间的界限是不明晰的，每种途径自身也是不太清楚的，所以运用者可能会感到难以认识和把握。然而，它们各自的趋势还是可以辨别确定的。女性的地位已经被确定，但在学术标准里她们还在寻求或拒绝某些特殊的家庭类型。

女性主义经验认识论提示，女性（在传统中我们都有自己无异

议的角色类别)到目前为止是处于国际关系内的,但正是拥有女性的社会所存有的性别偏见使我们对女性的科学认识受到了污染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理应提供自由的价值观和客观的研究成果但因为我们在特定的社会传统中,这使得从“已知”中分离出“已知者”的所有哲学,都将把男性的生存环境当做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继而,以歪曲和埋没女性的方式提出问题,设计方法,收集并解释材料(我们将在接下去的章节中通过分析一些例子来得出相关的结论,如据统计,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公民通常对性和性别的话题只字不提)(Yankelovich and Smoke,1998)。女性主义经验主义(男女平等主义的经验主义)广泛地号召人们,应回归到无偏见的哲学与方法论的科学使命中,并在科学的基础领域中,为“女性主义”提供一条通路。

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的认知方式中隐含着这样一种疑惑:即使是好的科学理论也往往无视女性的地位——因为它们只把女性作为母亲、家庭料理者、务农者、照顾者等角色。事实上,女性的活动延续着整个种族,并且为发展特殊的知识提供了丰富的根基,这些知识包括人际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女性要为争取发言权、认知权和自主者的身份而斗争。在科学文化中,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无论是传统主义还是行为主义,女性的角色行为和认知方式总是被贬斥为“本能的”“直觉的”“情绪化的”,对主流知识来说,这些特征甚至被认为是“女性”所特有的。通过女性为获得尊重和自身尊严的斗争,我们的认知方式也转变为认识论和政治立场,我们的知识也变成了那些支撑性的、有特权的知识——世界属于那些发动并赢得战争的人——相比之下,这种立场更不易遭曲解。一旦原有的性别束缚残迹被清除,以上的立场会成为一种指导方针,在它的指导下,还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

有些女性主义者谈到,后现代的“女性”成了“有问题”的“女

性”，她们让国际关系领域出现十分震惊的陌生感，于是前面所述的女性主义方法纷纷受到各种各样的支持或批评。众多的女性主义者怀疑，一方面‘科学’与‘女性’都成了主流文本，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两者又是非主流的。现代世界是一个西方人称之为女性有家庭剧本可演的世界，女性有自己的家庭空间，还有一整套乏味的美学和文化的指导纲要，还有一些所谓的“科学”研究为女性成功提供帮助。如果我们毫无批判地接受这些所谓“科学的”理论和“女性的”理论，那么我们所能听到的只能是受现有条件限制的声音，听到那些调节主体规范的声音。后现代进入哲学领域，使得女性主义者能质疑现代女性的社会规章，质疑那些将性别知识合法化的科学标准。

然而，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运动中，我首先要讨论两大思想源流（散见于各种不同的文献中）：女性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的女性主义首先，正如作为法国后建构主义哲学支流的后建构主义的女性主义所思考的，强调解构权威，包括解构那些一贯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拥有的“自我”权威（e. g., Foucault, 1982; Derrida, 1981）后建构主义的女性主义者通常被称为“法国人”（c. g., Irigaray, 1977, 1985b and Cixous, 1976），他们在象征男性中心秩序的建构和重构中，经常将话语看成一种权力。他们进一步分析到，在其他的一些事物中，从作为独立主体的女性身份（一直受男权影响）出发，她们在写作中，改革了语言及其意义（see discussions in Butler, 1990; Tong, 1989）；或者说，它们“通过赋予语言以各种意义，进行推论式的构建，似乎看到了性别差异……而实际在体现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各种言说中，女性是被抑制和误解的”（Dallery, 1989:52,53）。以美国为核心的女性主义者具有追求后建构主义哲学的特征，其兴趣更倾向于拒绝将（如泰勒萨·埃伯特提到的）“女性”、“女性体验”、“女性气质”无论是作为“自然”的身体还是

作为写作对象的“身体”，或作为某些法国女性主义者想象中女性气质)具体化,倾向于不将男性与女性的二元特征本质化。

在不确定的后现代时期，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能有机会去观察、倾听、讨论“女性”作出的回应，使她们自身融入到一种作为“独特的知识类型”的多元的后建构主义中（C. Brown, 1992b: 319），或者说，作为一种刚出现的意识形态，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种空洞理论的支持者）的叙事结构结合在一起，尚需要支持者的忠诚拥护（Ferguson and McClure, 1991: iii）。这种后建构主义“抵制或解构各种文化假设”（Jancks, 1989: 16），既然男性与女性（甚至可以是女性主义者）是各种文化假设出来的模本，那么“人们就会怀疑是否有可能确定某些立场，以女性的方式说话和行动，因为所有这样的立场都不是自然给定的而是由社会和历史建构的”（R. Walker, 1992: 192）

正如评论家赛拉·本哈别（Seyla Benhabib）所指出的，“女性主义导致了‘乌托邦的消退’，在现代主义的视野里，我们是按照已经存在的合理计划，对现实社会和政治法则进行全面重构’，但这也是一种意义，否则，我们不再“渴望……现实中尚未出现的理想”，因而，乌托邦式的思考是“实践的——道德驱动力”。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信念是，真正的女性存在于、并依赖于“实践的——道德驱动力”，它的出现是女性主义立场论与女性主义的后现代怀疑论之间调和的结果。这种彬彬有礼的折中立场说明了这样的问题：“女性是怎样被置于中心和非中心地位的（K. Ferguson, 1993:3）？”当人们将怀疑的目光投向盛装包装的女性身份时，我们如何关心女性，并使她们的经验得以升华？同时，我们能否拥有各种有意义的身份，并对它们提出质疑？或者说，我们是否必须在认同和拒绝认同之间进行选择呢？我们能够揭示那些为女性预设的主体意义，并赋予她们个人与社会的实践以新的意义，进而将她

在实践中形成的新主体性理论化吗？(Elbert, 1988:23)

比如说,凯茜·弗格森(1993:28)认为,我们会形成许多‘陌生’的混合身份。她论证道,无论何时,当我们以‘女性’的认知方式来思考时,即通过曾被遗忘的‘透镜’来重新解释这个世界时,我们便打开了通往主体性之门,“这种无人拓殖的主体性,更多的是对现代性学术策划的抵抗”。事实上,与其说是女性主义发现了“一种”女性的方式,不如说是立足女性主义立场的研究已经揭示了许多女性的特殊地位以及许多能挑战质疑这种特殊地位的学术策略(c. g., Steady, 1987; Mohanty et al., 1991; Anzaldúa, 1990b; Sylvester, 1993b; 1993c; 1993d)。这种多元的实现意味着,在我们急于用火炬去照亮性别的现代大楼—公寓—工作室—小屋—杂屋—棚舍之前,随着我们探寻‘女性’生存领域(或生活空间)中的丰富宝藏,我们就会对这种被规定的‘女性’产生怀疑。应当说,每一个空间给了我们不同的主体性地位和不同的身份内涵。这样,为了获得有意义的身份,并质疑它们,我们可以站在某一立场,从鉴赏者的角度,以情感的、批评的目光对他人的立场进行凝望审视,以防曾有过的‘殖民化’。

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立刻质疑:仅仅通过揭示被遮蔽的女性事实,是否能改革各种现有的准则。另一方面,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是由‘男权’错误地发现的,但如果不对那些生活知识进行检验(这些知识正是由那些被排除出去的女性所获利的,并一直被我们忽视了的),就宣称放弃这种观点,那么,人们会对此提出质疑。而现在(下面将会有更多的阐述)我们把‘女性’作为男权统治下的合法存在的固定对象,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不能直接与这些固定对象对话。不承认性别是另一种压迫和压抑的社会结构,这在抽象的知识层面上可以做得很好,但在实践中,意味着抹杀了另一些人的观点,他们不同意我们把性别理解成琐碎的、转瞬即逝的、

或不实在的东西。而正是远离了这些人的“画家象”，才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使移情作用成为可能。“女性”能够一再被排除，但也可以用“圈地”的方式，一再地被构建出来，而随着这种构建出现的谬误（也是自相矛盾的），也的确令人感到特别烦恼（Bordo, 1992: 161）。他们声称，那些拥有“纯粹的谬误”并迷惑人的人，其实都是“乌托邦主义者”，但也正是这些人拒绝埋没潜在的女性知识。乌托邦主义者的审视角度是多方位的。

后现代女性主义是通过一种激进的、情感对话式的政治学完成其理论“圈地”的，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传统认同的范畴所包含的能量与局限，也有助于我们决定自己的身份、理论、政治学和日常的关注点，而不是从已有的权力资源出发，推导出这些知识，或不加限制地拒绝这些知识。⁽¹⁷⁾ 我们需要这种移情作用的方式，以此引导出“女性”的主体性，而这种主体性在公认权威的眼中一直是不存在的，但它们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有效的归属，其结果是：当我们的身份意义不断变化时，我们不仅能欣赏自己拥有的、由他人规定与创造出来的一方空间，而且还能“真实地听取别人所说的……并力图把别人的观点融入我们自己的观点中，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种融合而发生改变”（Hirschmann, 1992: 252）。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后现代时期的女性主义所提出的挑战、视域互动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阐述，而不是为了使女性主义或非女性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教条、忠实伙伴和意识形态成为可能。⁽¹⁸⁾

为什么研究后现代？

女性主义认识论和国际关系争论交锋的日益增长，已呈现出我们所处的‘现代后期’或‘后现代’的超常征兆，在这一时期中，知